

从简帛文献看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

李建平 张显成

摘要：关于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，从传世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，甚至晚至宋元之际。今从简帛文献来看，两汉时期汉语量词系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：类系齐备，数量丰富，分工细密；使用频率高，使用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开始占据优势地位；语法化进一步发展，泛指量词广泛使用，“数+量+名”结构产生；语法功能进一步拓展，词缀式、“名+量”式构词方式都已产生。

关键词：简帛文献；量词；语法化

中图分类号：H121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1)01-0073-05

量词丰富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一大特色，但量词系统并非先在的，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语法化过程。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及其动因，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。但正如刘世儒先生所言：“汉语量词，历史悠久，材料浩繁……只有把量词的各个历史横断面都研究好了，汉语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。”^①量词的断代研究，刘先生导夫先路，对魏晋南北朝量词进行了系统考察，但目前量词断代研究做的还很不够，对于量词起源的动因、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、“数+量+名”结构的来源等诸多问题仍聚讼纷纭。

一、量词系统建立的判定标准

对于汉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问题，主要有两种观点：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刘世儒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量词进行了断代研究，提出这一时期量词体系完备，标志着汉语量词系统的正式建立。郭锡良先生也认为：“汉代以后，数+（量）+名的结构开始产生。但是汉代数词一般还是直接与名词结合……

^①刘世儒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3页。

收稿日期：2010-07-03

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《简帛量词研究》(05BYY003)。

作者简介：李建平（1980—），山东东营人，西南大学文献所博士生，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，主要从事简帛语言文字研究。

张显成（1953—），四川成都人，西南大学文献所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简帛语言文字研究。

魏晋以后，单位词才完成了分化的过程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量词范畴。”^②二是宋元时期，石毓智认为“汉语的个体量词，萌芽于两汉，产生于魏晋，稳步发展于唐宋，牢固建立于宋元之际”。^③即宋元之际，“数+量+名”结构在语言中占据了优势，标志着量词范畴的最后确立。

传世文献的量词研究往往强调“数+量+名”结构在量词发展中的地位，如王力先生说：“这是很重要的转变，可以说是一种飞跃……因为当数词和单位词放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；后来单位词移到了名词前面，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，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。”^④

“魏晋六朝说”和“宋元说”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量词系统建立的时代，我们认为这一结构的产生诚然在量词语法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，但并不是量词范畴建立的唯一标准：首先，早在战国楚简中这一结构就出现了，达到64例之多，但先秦显然只是量词的萌芽期；^⑤其次，当汉代簿籍类文献中量词使用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时，数词不再与名词直接结合，而是要同量词组成数量结构才能充当句子成分，即“名+数+量”结构在称数样式中占据了优势地位，而“数+量+名”结构仍很罕见；再次，从其它量词

^②郭锡良《从单位名词到量词》，载《汉语史论集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6年，第38页。

^③石毓智《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96页。

^④王力《汉语史稿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240页。

^⑤李建平《战国楚简中的量词及其语法化》，载《简帛语言文字研究》第三辑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8年，第42页。

语言来看，藏缅语族中的彝语支、缅语支、羌语支和克伦语支量词都比较丰富，但却采用“名+数+量”语序，显然不能因为这些语言中没有“数+量+名”结构而否认其量词范畴的存在。

因此，我们认为“数+量+名”结构的产生与发展是判断汉语量词范畴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，但并不是唯一标准，还应当综合考察量词内部类系的发展、量词数量的扩张（尤其是个体量词数量的扩张）、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的使用频率、量词的语法功能、量词的语法化程度等各个方面。尤其是当使用量词在数量表示法中占据优势，数词在计数时不再和名词直接结合，而是首先和量词组成数量结构共同充当句子成分时，即使量词没有出现在“数+量+名”结构之中，其语义及语法功能和名词无疑有了明显的区别，量词范畴就已经建立起来。

二、从简帛文献看汉代量词的发展

简帛文献的出土，尤其是大量遣策类、簿籍类等文献的出土，为汉语量词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“同时资料”或“准同时资料”，^① 我们对已公布的 78 种出土先秦两汉魏晋简帛文献中的量词系统做了穷尽性的整理研究，认为两汉时期汉语量词范畴已经建立起来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。

（一）量词部类发展完备，数量丰富。

1. 动量词已经产生，量词两大类系齐备。从传世文献来看，对于先秦动量词傅铭第先生举出“周”、“匝”两个，^② 但仍可视为名量词；杨伯峻、何乐士二先生又举出“巡”、“成”2个，^③ 但仍可视为动词。确切无疑的动量词先秦未见，即使到西汉也仍然罕见；^④ 但从简帛文献看，动量词萌芽于先秦，两汉获得了发展。

从出土文献看，秦简有“步”、“课”两个动量词。“步”凡 6 例，如《周家台秦简》326：“见东陈垣，禹步三步。”又 332：“见车，禹步三步。”禹步，是古代巫师作法时的一种行步方法，《玉函秘典》：“禹步法，闭气先前左足，次前右足，以左足并右

① 太田辰夫《中国语历史文法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 81 页。

② 傅铭第《关于动量词“匝”和“周”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65 年第 1 期，第 27 页。

③ 杨伯峻、何乐士《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》，北京：语文出版社，1992 年，第 204 页。

④ 杨剑桥《汉语动量词不产生于先秦说》，《语言研究》2009 年第 4 期，第 22 页。

足，为三步也。”“步”强调的并非距离，而是动作，“禹步三步”意为“禹步三次”；可见“步”为动量词无疑。“课”仅 1 例，睡虎地秦简《秦律十八种》19：“今课县、都官公服牛各一课。”课，即考核；一课，即考核一次。二者均从动词义借用而来，即“同源动量”。

两汉简帛中动量词获得了初步发展，有“通”、“发”、“辈”、“伐”、“下”、“周”、“反”7 个，如：

- (1) 出堠二苜火一通。(居延汉简 486.49)
- (2) 第八隧攻侯障君，与主官譚等格射各十余发。(居延汉简 EPF16.47)
- (3) 駃主新黔首籍，三輩战北，皆并居中一笥中，未有以別智(知)当捕者。(张家山汉简·奏谳书 140)
- (4) 铖即蹀治(笞)讲北(背)可十余伐。(张家山汉简·奏谳书 107)
- (5) 敝辞曰：初欲言，候击敝数十下，肋痛，不耐言。(居延汉简 123.58)
- (6) 画地三周，宿其中。(居延新简 EPT59.137)
- (7) 三人负麻，人反十八束，反复卅里。人再反，六十里。(敦煌汉简 1650)

其中，动量词“通”在汉代使用频率已经很高，如《居延汉简》24 例，《居延新简》6 例，《敦煌汉简》10 例。“下”和“伐”均是称量“打击”义动词的，二者很快合流。“通”、“发”、“辈”、“下”、“周”、“反”6 个，均沿用到魏晋六朝以后。

2. 量词数量丰富。甲骨文量词不到 10 个，^⑤ 金文发展到 40 多个。^⑥ 先秦简帛文献中量词 79 个，其中个体量词仅 25 个；《左传》量词 60 个，但多度量衡和编制单位，个体量词仅 12 个；^⑦ 《战国策》量词 39 个，个体量词仅 7 个，均为物量词；《论衡》中量词 43 个，个体量词仅 16 个。而两汉简帛文献中，物量词总数达到 130 个，其中自然单位量词 69 个，而语法化程度最高的个体量词则达到 46 个之多；^⑧ 简帛量词使用如此广泛，应当与简帛文献多加

⑤ 李若晖《殷代量词初探》，《古汉语研究》2000 年第 2 期，第 79 页。

⑥ 黄载君《从甲文、金文量词的应用，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展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64 年第 6 期，第 432 页。

⑦ 何乐士《〈左传〉的数量词》，载《古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0 年，第 343 页。

⑧ 李建平、张显成《先秦两汉魏晋简帛量词析论》，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09 年第 4 期，第 69 页。

簿、遣策类文献，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数量表示法之面貌有关。

表一：两汉简帛物量词总表

个体量词	46	枚、个、乘 ₁ 、两 ₁ （辆）、艘、口、头、匹 ₁ 、骑、所、处、区、领、衣、裁、编、篇、章、卷、牒、等、级、石 ₁ 、条、瓣、发、节、成、颗、丸、梃、人、辈、封、通、合 ₁ 、张、物、事、本、岁、算、只、件、种、函
集体量词	23	乘 ₂ 、两 ₂ 、双、偶、纯、把、束、絮、簇、具、堵、积、𦵹、齐（剂）、分 ₁ 、撮、三指撮、户、家、室、术、稷、升
借用量词	27	笱、籃、筭（篋）、筭、籠、筐、笼、筭、椟、杯、椑、棓、资、匱、塈、罂、刀圭、刀、匕、方寸匕、器、盛、鼎、盂、囊、橐、车
度量衡量词	34	分 ₂ 、寸、尺、丈、寻、匹 ₂ 、幅、步、里、围、石 ₂ 、斛、斗、参、升、合 ₂ 、龠、巵、石 ₃ 、钧、斤、两、铢、分 ₃ 、顷、亩、石 ₄ 、畦、步、版、钱、布、金、分 ₄

3. 量词的分工进一步发展。量词语法化的初期总是有很多兼职，随着量词的日趋丰富，其分工也逐渐明晰，到两汉简帛中量词的分工已经相当细密，如就物体而言，粒状或圆形物一般用“颗”，药物则用“丸”，条形物则用“梃”；就交通工具而言，船用“艘”，车用“两”或“乘”，而“乘”多量“马车”，“两”多量“牛车”，也有分工的趋势；就有生之物而言，人用“口”，鱼、牛、羊用“头”，马用“匹”，一人一马则用“骑”。例不赘举。

（二）使用频率高，使用量词在称数法中占据优势地位。

刘世儒先生认为：“在上古数名组合须要通过量词介绍这一规范还没有形成（两汉）或者根本就不存在（先秦）。”^①而从简帛文献来看，这一规范其实始于先秦，形成于两汉。

从先秦简帛看，27 种文献中物量表示法总计 2337 例，使用量词的 718 例，占 30.7%。从传世两汉文献看，量词的使用频率仍不高，我们统计了《礼

①刘世儒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，第 32 页。

记》、《论衡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盐铁论》五种文献，其中物量表示法凡 2070 例，使用量词 448 例，仅占 21.6%。但从两汉简帛看，我们选取成书时代明确的 24 种汉简中的物量表示法进行了全面统计：^②

表二：汉简物量表示法统计表

称数样式	频率	总计	比例
数+名	231	798	46.4%
名+数	484		
数词单用	83		
数+量	130	921	53.6%
名+数+量	777		
数+量+名	9		
量词单用	5		
总计	1719	1719	100%

量词的使用占物量表示法的 53.6%。《居延汉简》物量表示法总计 4280 例，使用量词的达到 2746 例，占 64.2%。^③尤其在准确计量的遣策类文献中，量词的使用更是必不可少，如汉初的马王堆 3 号墓遣策，数量结构总计 524 例，“名+数+量”结构 314 例，占 59.9%；凤凰山 167 号墓遣策称数结构 81 例，“名+数+量”结构 71 例，占 87.7%。由于书面语言的滞后性，可以推测当时口语中量词的使用频率应当更高。如此高的使用频率，无论是先秦还是两汉，都是传世文献量词研究所未知的。可见，使用量词在汉代无疑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规范。

（三）量词语法化的发展。

1. 泛指量词的成熟。泛指量词是量词系统中最特殊的一类，其源词义几乎完全消失，语法化程度最高，汉语史上泛指量词有“枚”、“个”两个。从传世文献看，“枚”在《史记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新书》、《新序》、《盐铁论》、《法言》、《新语》9 种西汉文献中仅 6 例，而西汉简帛

②24 种汉简为：焦山汉简、萧家草场简、未央宫汉简、清水沟汉简、高台汉牍、古人堤汉简、甘谷汉简、邗江汉简、平山汉简、花果山汉简、海州汉简、胥浦汉简、东牌楼汉简、罗泊湾汉简、大坟头汉简、孙家寨汉简、孔家坡汉简、凤凰山 8 号墓汉简、凤凰山 9 号墓汉简、凤凰山 10 号墓汉简、凤凰山 168 号墓汉简、凤凰山 167 号墓汉简、凤凰山 169 号墓汉简、马王堆 3 号墓汉简。

③陈近朱《〈居延汉简〉中物量词和称数法探析》，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4 年通过，第 40 页。

则很常见，仅写成于文帝至景帝的《凤凰山 167 号墓简》中即有 37 例之多，而《凤凰山 8 号墓简》中则可以称量有生之物“鱼”等。时代稍后的《居延汉简》（包括《新简》）179 例，《敦煌汉简》15 例，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21 例，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，可以自由应用于无生、有生之物，无生之物包括各种器皿、席子、皮革、木制品、钱币、兵器、衣物、封签、绳索等等，有生之物既包括树木等植物，也包括狗、鸡、鱼等动物。无生之物用例传世文献常见，此不赘列；有生之物用例如：

(8) 不移转牛凡三百廿九枚，见二百枚不付。（敦煌汉简 1168）

(9) 出鱼卅枚。（居延汉简 274. 26A）

(10) 入狗一枚。（同上 5. 12）

(11) 出鸡一枚，以食使者王君，一食，东。（悬泉汉简 121）

可见，泛指量词“枚”在汉初已广泛应用，汉代中期臻于成熟，到汉末三国时期的吴高荣墓《遣策》木牍（写成时代在公元 232—238 年之间）中，所计量事物几乎全部用量词“枚”来称量：

(12) 故练祫一枚；故绢祫一枚；故绢祫一枚；故练祫一枚；故练祫一枚；故练縕裙一枚；故绢縕裸一枚；故练两裆一枚；故练单裸一枚。故绢单裸一枚；故半纁縕缚一枚；故半纁縕缚一枚；故练縕缚一枚；故练縕缚一枚；故练小缚一枚；故练縕祫二枚。（正面）

该木牍 79 个称数结构中，使用量词“枚”达到了 75 例之多，占总数的 95%。量词系统中语法化程度最高的泛指量词的成熟，也说明了当时量词系统的发达程度。^①

2.“数+量+名”结构的产生。“当数词和单位词放在普通名词后面的时候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够密切的；后来单位词移到了名词前面，它和名词的关系就密切起来，渐渐成为一种语法范畴。”^②传世先秦文献“数+量+名”结构罕见，尤其自然量词的用例，贝罗贝等认为这一结构是晚至汉代才出现的。^③从先秦简帛看，“数+量+名”结构已较多见，而且

^①以上可详：李建平、张显成《汉语泛指性量词“枚/个”的兴替及其动因》，《古汉语研究》2009 年第 4 期，第 64 页。

^②王力《汉语史稿》，第 240 页。

^③贝罗贝《上古、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》，载《语言学

其发展体现出了强烈的地域性。楚简帛凡 64 例：度量衡量词 1 例，借用量词 7 例，个体量词 46 例，集体量词 10 例。如：

(13) 三匹驹骝。（曾侯乙墓简 148）

(14) 一格车轔。（包山楚简 269）

(15) 二真楚甲，素。（曾侯乙墓简 122）

(16) 阳城君三路车，鄖君一乘，旅公三乘路车。

（曾侯乙墓简 119）

(17) 一两缘襌屨；一两丝 屦；一两鄖缇屨；

一两証屨；一两綵屨。（信阳楚简·遣策 2）

数量结构作定语有时候可以加“之”，如上博简《容成氏》44：“是乎作为九成之台。”楚简帛此类结构多见于遣策类文献，而时代稍晚的秦简中却仅 2 例，且均为度量衡量词。两汉简帛也很少见，且限于度量衡和借用量词，所调查的 24 种汉简中仅 9 例，均为度量衡量词，这可能与楚简帛多簿籍类文献有关。两汉时期，“数+量+名”结构在数量表示法中虽然比例还很小，但在大量文献中，其总数已经很多，正如潘允中所言：“在汉代的文学语言里，已经把这种语法形式巩固下来，无论自然单位的量词也好，度量衡的量词也好，都已经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了。”^④如：

(18)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。（史记·大宛传）

(19) 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。（同上）

(20) 母见其上若一匹练状。（论衡·吉验）

（四）量词的语法功能进一步拓展。

1. 词缀化构词法的形成。“名+量”构成新词，量词失去了表量功能，成为词缀，王力先生认为：

“这种结构是相当后起的……直到宋元时代，单位词才用作词尾。”^⑤刘世儒认为产生于南北朝：“在这个时代以前，这种构词法一般说还没有形成。偶然出现几个零星的例子，也只能说还是一种‘萌芽’，因为数量太少，又多有问题，还不能形成一种范畴。”^⑥

但从两汉简帛来看，“名+量”结构的双音词已经产生，而且数量也很不少，例如：

(21) 告尉谓第廿三候长建国受转谷到，□言车两石斗数。（居延汉简 145. 2）

(22) 仓谷车两名籍。（居延新简 EPT52. 548）

^①《论丛》第 21 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8 年，第 108 页。

^④潘允中《汉语语法史概要》，郑州：中州书画社，1982 年，第 119 页。

^⑤王力《汉语史稿》，第 244 页。

^⑥刘世儒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，第 16 页。

(23) 阳朔二年正月尽十二月吏病及视事书卷。
(居延汉简 8.1A)

(24) 建武季年四月以来，府往来书卷。(居延新简 EPT22.409)

“两(辆)”、“卷”用作量词在两汉简帛已很普遍，因此在这一时代“车两(辆)”、“书卷”为双音复合词是毫无疑问的。从文意及所处的语法位置来看，也无疑义。

2. 偏正式复合词“量+名”构词方式的产生。刘世儒认为：“到了南北朝才更通行起来。”^①其实在《睡虎地秦简》中就已经很常见，例如：

(25) 雨为澍，及诱(秀)粟，辄以书言澍稼、诱(秀)粟及狠(垦)田暘毋(无)稼者顷数。稼已生后而雨，亦辄言雨少多，所利顷数。早(旱)及暴风雨、水潦、螽、群它物伤稼者，亦辄言其顷数。(秦律十八种 1-2)

(26) 禾粟虽败而尚可食歰，程之，以其中耗石数论负之。(效律 24)

“顷数”、“石数”为“量+名”式复合词无疑，到了汉简就非常普遍了，如：

(27) 直(置)所得米升数以为法，有(又)值(置)一石米粟升数而以耗(耗)米升数乘之【以为实】，如法得一升。(张家山汉简·算数书 49)

(28) 亦以一尺寸数为法，以所得寸数乘一尺贾钱数为实，实如法得一钱。(同上 63)

仅《算数书》中“量+名”偏正式名词就甚多，如“步数”达 12 例，“钱数”8 例，“升数”5 例，说明“量+名”构词形式在两汉已经发展成熟。

3. 组合能力的发展。量词一般同数词组合共同充当句子成分，古今皆然。两汉时代量词已经可以同疑问代词、形容词等其他词类组合，例如：

(29) 今织有攻(功)五十尺，问各受几何尺。

(张家山汉简·算术书 54)

(30) 今误券三斗一升，问几何步一斗。(同上 68)

(31) 取弱(溺)五斗，以煮青蒿大把二、鮒(鲫)鱼如手者七，治桂六寸。(马王堆帛书·五十二病方 248)

量词单独使用时，刘世儒提出在魏晋南北朝可以充当定语、主语、状语三种句法成分，实际上早在秦简中就已常见，两汉简帛更获得了进一步发展。仅以《睡虎地秦简》为例：

(32) 赐田啬夫壺酒束脯。(秦律十八种 13)

(33) 顷入刍三石、蒿二石。(同上 8)

(34) 其以牛田，牛減繫，治(笞)主者寸十。

(同上 14)

三、小结

从出土简帛文献来看，两汉时代量词系统已经建立起来，体系完备，数量丰富，分工较为细密，尤其是数量表示法中量词观念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，数词一般先同量词组合为数量短语才能共同充当句子成分；量词的各类语法功能均已经产生，只但是在初期使用频率较低，但在语法功能上已经和源名词或动词有了很大差别；语法化程度最高的泛指性量词“枚”获得了广泛而高频率的使用，语法化程度很低的拷贝型量词则已经消失，量词的语法化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。

汉语量词系统发展的框架在两汉已经构建起来，魏晋以后量词在这一框架中进一步充实、发展，直到宋元之际“数+量+名”结构占据绝对优势地位，量词系统臻于完善，才同现代汉语没有太多差别了。

(责任编辑：陈剑)

①刘世儒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，第 17 页。